

■ 中/国/意/识/形/态/研/究/丛/书
陈方勤 陈亚杰◎主编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

陈亚杰 著

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语境

New Enlightenment
And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Sincized Marxism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中国/意识/形态/研究/丛书
陈方勤 陈亚杰◎主编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

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语境

New Enlightenment

And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Sinicized Marxism

陈亚杰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陈亚杰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225-706-1

I. 当… II. 陈… III. ①社会运动—文化事业—中国—民国

②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G129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8201 号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

陈亚杰 著

责任编辑: 许 彬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一版 200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06-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建国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具有自己独有的经验,也面临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处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原有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何种变化?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将是何种发展走向?这些都值得研究和重视。

“中国意识形态研究”丛书的出版,就是为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的有见地的科学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平台。近年来,有些慧眼独识的研究成果,只能零星发表。且发表后湮没于泛泛之作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取得应有的影响力和得到应有的重视。丛书期冀发挥集中优势,在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增加新的空气,新人耳目,同时也为关心和从事实际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士提供参考意见。

这套丛书力求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做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简单介绍和移植(主要体现于文艺界),甘于对中国现实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保持缄默;二是流于毫无新意的循环论证或虚假论证,被人斥为“假大空”的宣教。

丛书坚持以下编写思路: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2.力图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多采用科学实证的研究,少作“理论”的形而上论证。考证历史,不用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关注现实,借助多学科的分析视野。3.既为了解中国古代和当代意识形

态的基本状况提供资料,也为如何处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

丛书内容具有广阔的包容性。理论和实际问题、历史和现实课题,均可包含其中。就主要领域来说,重点包括四方面内容:1.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研究;2.中国意识形态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3.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史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历史);4.中国历史上的意识形态研究(古代和近代)。

主编 谨志
2009年6月

目录

内容摘要	1
导论	4

- 一、何谓“新启蒙运动”:本书研究对象的界定
- 二、为何研究新启蒙运动:选题的意义及基本研究思路
- 三、新启蒙运动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上 篇

第一章 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	24
----------------------	----

- 一、国民党政权的“党治”文化政策
- 二、“满洲国”的奴化教育与日军侵略理论
- 三、分化与颓废:从“五四”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思想文化界
- 四、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第二章 新启蒙运动的发展进程	42
----------------------	----

- 一、“新启蒙运动”的提出
- 二、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及其讨论高潮
- 三、新启蒙运动的继续发展和落幕

第三章 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内容	89
----------------------	----

- 一、新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观

- 二、新启蒙运动的爱国救亡思想
- 三、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自由观
- 四、新启蒙运动的中国文化发展观

下 篇

第四章 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	132
一、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继承	
二、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和超越	
三、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五四观的发展	
第五章 新启蒙运动与中国的启蒙问题	170
一、新启蒙运动中的启蒙观	
二、新启蒙运动与中国“救亡式启蒙”	
三、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的启蒙问题	
第六章 从新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8
一、新启蒙运动与“中国化”口号的提出	
二、新启蒙运动参加者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证	
三、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中国化”主张	
四、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背景的分析	
结 语	225
附录一:新启蒙运动文章目录	229
附录二:启蒙学会组织章程	237
附录三: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研究综述	239
主要参考文献	254
后 记	262

外文, 恩恩, 帝德德国中升平 04—0E 55 世 0C 得位以, 张台关张的香
; 战时最背杯友。最背史更的保益紫白陈紫再图式, 点重式另对本基
要初到第口已育德升紫的“同而斯”, 策紫升文帝紫的银紫国另中
有共国中文以另升本基的另升文恩恩国中升平 0E 厘“四五”从, 帝

内 容 摘 要

善已矣, 强式同和以章本, “帝紫紫紫的德紫紫白紫”式章二解
一丁升德紫紫白紫的升丁平 0401 厘只 2 平 0401 从以, 帝式紫紫的
本, 同和升正四丁升紫紫的, 帝紫紫紫从德紫紫白紫, 紫紫史更紫
高已紫紫, 出紫式升紫紫一益紫, 紫式更紫紫又的另升文恩恩以章
德紫紫的升升善紫紫的入事升得位以重。恩紫大三紫紫已紫紫, 帝
本书根据大量的报刊资料和当事人的著述, 围绕 20 世纪 30—
4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社会背景, 对新启蒙运动的发展演变进
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梳理。在此基础上, 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新启
蒙运动提出了哪些政治、思想和文化主张? 这一运动对“中国化”的
倡导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历史联系? 新启蒙运
动为什么把五四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 分析新启蒙运动是否可以
加深我们对中国启蒙问题的理解?

本书由导论、正文和结语组成。

导论部分在分析学术界对“新启蒙运动”内涵的三种理解之后,
对论文的研究对象作了界定: 新启蒙运动是指 20 世纪 30—40 年代
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 在“新启蒙运动”口号下进行的有关思想、文
化、组织和社会活动。然后, 阐明这一选题的意义及本书“以小见大”
的研究旨趣; 评述国内外本课题研究现状; 介绍本论文“两种结合”
的研究方法, 即: “内部理解”与“外部理解”相结合、“内部批判”与
“外部批判”相结合。

本书之正文部分有六章, 分上下两篇:
上篇包括三章内容, 系新启蒙运动基本史实研究。
第一章为“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本章结合新启蒙运动倡导

者的相关论述,以分析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基本状况为重点,力图再现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这种背景包括:中华民国政府的党治文化政策、“满洲国”的奴化教育与日军侵略理论、从“五四”到 3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本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四个方面。

第二章为“新启蒙运动的发展进程”。本章以时间为经、参与者的著述为纬,对从 1936 年 9 月到 1940 年 7 月的新启蒙运动作了一番历史考察。新启蒙运动从兴起到落幕,前后进行了四五年时间。本章以思想文化界的反响程度为界,把这一进程分为提出、发展与高潮、沉寂与落幕三大阶段。重点分析当事人的理论著作和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历史事件。

第三章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内容”。本章以新启蒙运动亲历者和研究者何干之先生的概括为中心,对新启蒙运动的理性观、思想自由观、爱国主义观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作了一番详细的梳理。文章注意追随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思想触角,考察这一运动宏富的思想内容。立意再现原貌、不做过多评价。

下篇亦有三章,以多维视角考察历史天平上的新启蒙运动。

第四章为“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运动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自况。新启蒙运动既有对“五四”的赞扬,也有对“五四”的批评,更有试图对“五四”的超越。本章主要考察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认知,以“打倒孔夫子”口号为例,重点分析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重塑式的理解与超越。在此基础上,比较新启蒙运动五四观与毛泽东的五四观之异同,对新启蒙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五四认识史上的地位作一估量。

第五章为“新启蒙运动与中国的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以“启蒙运动”自称的思想文化运动。本章考察新启蒙运动对“启蒙”与“启蒙运动”内涵的理解,然后从辨析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种种论说入手,分析中国“救亡式启蒙”的特点及其

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体现。在比较现代化的视野下,对中国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作了剖析,以此为坐标来衡量“重建国家”式的革命之历史合理性,评价新启蒙运动对国家重建的种种思考。

第六章为“从新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章首先考证了1937年前后新启蒙运动参与者对“中国化”的倡导,简要分析新启蒙运动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然后详述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证和张申府、柳湜等人的“中国化”主张;最后重点论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社会广泛弥漫的“中国化”思潮,分析新启蒙运动对“中国化”的敏锐的问题意识,以此来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

结语部分简略分析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并以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为理论指南,对今日中国的启蒙问题作一基本判断。

关键词:新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语境。五四运动。救亡式启蒙。中国现代化。

导 论

新启蒙运动一题,讨论范围、评价标准、研究方法,学界颇多歧见。本章将对上述问题略抒己见,以为本书之基。

一、何谓“新启蒙运动”:本书研究范围的界定

欧洲研究启蒙运动的力作《启蒙运动》一书作者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认为:启蒙运动和历史上发生的具体历史事件不同,在研究启蒙运动时,“唯有在我们能够使某些‘信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孤立起来,并且使它们成为某一特定时代之特征的时候,才会显得真实”。“我们充其量也只能把它(启蒙运动)看做是一种非常具有意义的统计学上的集中现象,而不能把它看做是一个事件”。但是,我们无论怎样给启蒙运动下定义,它的某些特征都曾在大多数的时代中出现过,“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全部接纳了它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的这些‘特征’,只不过是一些‘态度’(attitudes)而已,而不是‘事实’(facts)”,而历史学家认为哪些“态度”才是启蒙运动的典型态度,这完全是个自由的、主观的选择。比如,启蒙运动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卢梭,我们可以说他是启蒙运动最伟大的作家,但是,同样有人可以说,卢梭是启蒙运动的“最有力

的、文笔最流畅的反对者”。因此,汉普森不无偏激地指出:“在某个限度内,你认为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就是什么。”^[1]

尽管笔者并不完全同意汉普森的说法,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第一,他描述了欧洲启蒙运动研究中的一个事实;第二,他所揭示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新启蒙运动研究之中。

何谓历史上的“新启蒙运动”,也就是说,“新启蒙运动”史到底要研究什么内容?对此,国内的研究者也是众说纷纭。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种说法:^[2]

第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以“新启蒙运动”为口号的思想文化运动并没有形成大的规模,所以不能使用“新启蒙运动”的提法。这种观点以李新和胡绳两位先生为代表。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在1981年重印时删去了第一次印刷本中《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一节,理由是:“不只因为这次运动的发起者中有陈伯达其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次运动刚发起不久,尚未真正展开,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来看,不写它是完全可以的。”^[3]胡绳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不再使用这个当时虽曾提出但不久就不再使用的‘新启蒙运动’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应当承认,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几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确是进行了一次颇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称之为一个运动也未尝不可,但这运动不始于‘新启蒙运动’口号的提出,也不需要称之为新启蒙运动。”^[4]那么,对这场历史上确实

[1] 以上引文均见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启蒙运动》一书绪论,李丰斌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

[2] 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还有一场以“新启蒙”命名的运动,但本书主要讨论的是30-40年代的这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前者的介绍和评价,可以参见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一文,见其《另一种启蒙》一书,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3]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二次重印本重印说明。

[4] 《胡绳全书》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9页。

曾经发生的事件何以称之呢?李新、胡绳“破而不立”,没有作答,倒是吴雁南、黄一兵使用了“新启蒙思潮”的提法。^[1]

第二种观点直接沿引历史上这场运动提出的“新启蒙运动”的名称。认为这场运动以“新启蒙运动”的口号相标榜,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因此,可以直接用“新启蒙运动”来指称这场运动。学术界大多数人都赞同这种观点,虽然没有明言,但从他们研究中对“新启蒙运动”范围的驾驭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启蒙运动不仅包括以“新启蒙运动”为口号的思想文化工作,而且包括在此前后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工作。这种观点以李慎之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新启蒙运动“新”就新在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五四启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所加于人民之“蒙”,而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因此,1940年1月,毛泽东写成并出版《新民主主义论》才应被看做是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从此以后,新启蒙就有了标准的、权威的教科书。”新启蒙运动的最后完成应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到那时,新启蒙才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旧启蒙”。^[2]这种观点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已出现,1940年李平心先生就提出类似的看法。^[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陈力丹完整地表述了这种观点:“所谓新启蒙运动,即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日寇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便是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4]

[1] 参见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章;黄一兵:《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思潮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 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载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3] 参见万流(李平心):《新民主主义的溯源与新启蒙运动的重估》和《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与任务》,分别载于《上海周报》第2卷第1期(1940年5月11日)和第2卷第5期(1940年6月8日)。

[4] 陈力丹:《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观点〉》,载于《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分析起来,第一、二种观点的分歧在于:要有多大“规模”的事件才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的视野。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李新和胡绳观点也有差异:李新等先生并不否定这一场运动的存在。至于这一节因为“规模”问题该不该写入通史,也值得商榷。笔者可以做一个比较。拿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和五四运动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讨论的规模上,还是从引起的社会反响上,三次论战,都无法跟新启蒙运动相比。^[1]为什么三次论战可以进入书写视野,而新启蒙运动却在排斥之列呢?后来,吴雁南在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时,以“新启蒙思潮”的方式,将新启蒙运动编入书中。从后来者的研究眼光出发,用“思潮”一词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写“思潮”与写“运动”之间却似乎并不存在多大的矛盾。“新启蒙思潮”提出者也无意把这两者对立起来。^[2]但本书并不打算使用“新启蒙思潮”的提法。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理解来看,思潮是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是介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社会意识,它强调的是心理和意识层面。而本书的研究,虽然主旨是思想史,但研究的范围包括思想、组织和社会活动,不限于思想意识层面,并且论文要涉及新启蒙思潮以外的、广泛的思想文化背景。

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恰好相反。第一种观点不用“新启蒙运动”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运动,而第三种观点却坚持使用,并且把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几乎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分化(或者稍迟一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整段历史。支持第三

[1] 据新启蒙运动当时的参与者记载,在新启蒙运动的讨论时期,仅1937年5月,北平一地讨论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就有36篇(参见自非《新启蒙运动在北平》,载《读书月报》第2号)。启蒙学会成立后,北平教授联合会主席杨立奎甚至通电全国,予以抵制。抗日战争时期,新启蒙运动被张申府正式提上国民参政会,甚至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

[2] 综观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长篇著作,把许多近代的思想文化运动都称之为“思潮”,一种思想文化运动,一般都会引起社会思潮层面或大或小的波澜。

种观点的人不多。前引胡绳的观点似乎可以反驳这种提法:第一,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运动并不始于新启蒙运动的提出,第二,这种运动并不是在新启蒙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而且,在笔者看来,李慎之的说法在内涵和外延上和实际发生过的新启蒙运动都有一定的差距。就内涵来看,李慎之认为新启蒙运动的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不但“启”封建主义思想之“蒙,”而且“启”资本主义思想之“蒙”。而直接意义上的新启蒙运动的实际情况是,它并没有要求启资本主义之“蒙”。

这场运动虽然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主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不是革命的对象一样,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新启蒙运动当中是革命的盟友而不是革命的敌人。就外延来看,李慎之把新启蒙运动的时间定在“五四”到1949年之间。但是,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是1936年才提出来的。而且,李慎之认为新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活动,但是新启蒙运动不仅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还包括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活动。正因为李慎之所理解的新启蒙运动与直接意义上的新启蒙运动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差别,而且本书就研究范围来说,并不包括整段历史,因此也不拟采用李慎之先生的提法。

鉴于以上分析,本书将新启蒙运动界定为:20世纪30—40年代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在“新启蒙运动”口号下进行的有关思想、文化、组织和社会活动。这一界定,包括两个关键点:一是“新启蒙运动”口号,二是相关的思想、文化、组织和社会活动。

二、为何研究新启蒙运动:选题的意义及基本研究思路

思想史学界有许多学者坚持这样的观点:思想史涉及的对象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代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

识,换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1]但是,笔者感觉以“重大影响”来界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似乎不太妥当。第一,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没有思想家的时代,或者思想沉寂的时代,往往恰好是需要思想史研究的时代。第二,哪种思想和观念将“能够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恐怕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郭德宏、葛兆光和柯文(Kowen)三位先生的思想值得借鉴。

郭德宏先生近年提出了“民众史观”,他认为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不应该只研究国家领导人、知识和社会精英,应该花大力气研究普通民众。笔者正是在郭老师的指导下写作论文的,论文虽然主要写的还不是普通民众,不过,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大多关注中央领导人,而本书则把目光下移到了一般理论知识分子。

葛兆光先生认为:思想史应该研究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因为思想与学术,有时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悬浮在社会与生活的上面,而真正的思想,真正在生活与社会上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它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而且某些精英和经典在那个时代,究竟是否像思想史著作中所说的影响如此巨大与深远,是否应该在思想的历史顺序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实在很有疑问。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延续并直接起作用的,常常不是那些高明的思想,而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知识与思想。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2]

[1] 许纪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序言第1页。

[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3页。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即思想史不一定要研究在社会历史上发生多大“影响”(influence)的思潮和人物。但笔者与葛先生不同的地方在于，本书不是直接写30年代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方面思想文化背景，而是通过集中分析新启蒙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来写这一时代、知识和社会背景。

因此，这里还要提到美国学者柯文。柯文先生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与神话的义和团》等著作行世，其著作的共有特点就是：每一部都给人以史学方法论的启示。在柯文先生的成名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一书中，他详细地谈到选择个案(个人)作为历史研究的旨趣所在。他这样声明：

人生获得较大意义的途径之一就是影响别人。这里差异当然是很大的，范围从仅仅影响某一件事的人，直至像耶稣或毛泽东那种(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对于后者，我们应当特别留神。因为这里涉及的麻烦也是最终难以解决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确定假如“伟人”并未存在的话，历史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没有出现，近代中国历史将会改变进程。但我们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也不能确定历史进程会有哪些不同。

我们不能再现个人影响他人、个人生活总和转化成集体历史经历的过程。面对这种困难，许多历史学家发现——在洞悉集体经历的努力中去研究个人生涯仍属有益之举。这些个人不一定要有巨大影响。确实，不管个人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可能都是很难觉察的。真正唯一的要求是——个人经历所集中的问题或体现的类型也以某些方式在其他人那里表现出来。这样，即使他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他作为历史经历者的价值也可能是巨大的。

王韬正是这种例子。人们认为王韬能对孙中山、康有